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重点课题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编写组 编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

税收

中国税务出版社

F812.96
20124

阅 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度重点课题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编写组 编



中国税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编写组编.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0235-682-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革命根据地-税收-财政史-

中国-1921~1949 IV. ①F8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0996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 名: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

作 者:《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编写组 编

责任编辑:王静波

责任校对:于 玲

技术设计:刘冬珂

出版发行: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B 座)

邮编:100038

http://www.taxation.cn

E-mail:taxph@tom.com

发行部电话:(010)63908889/90/91

邮购直销电话:(010)63908837 传真:(010)63908835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23

字 数:323000 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35-682-5

定 价:56.00 元

如发现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 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的时期，先后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是根据各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财政方针开展的，具有鲜明的战时特征，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各地区自理到全国统一的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项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税制建设作了积极的准备，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税收工作方针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的税务工作者克服了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和顽强的毅力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发展经济，活跃市场，广开税源，正确处理军需和民负的矛盾，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同时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毛泽东曾作形象比喻，说党和人民军队是靠“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这里所说的“小米”，就可以理解为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实力。这些伟大的革命实践，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支柱。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新中国税制建立的过程也是这样，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产物，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紧密相联。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实践，为新中国税制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又为以城市为重心的税收工作积累了新的经验，并在干部、机构等方面为新中国税制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税收情况的了解和研究，人们还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能够避免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一度出现的财政经济混乱情况，迅速而顺利地接管大中城市，有条不紊地建立起新的经济、财政和税收制度，顺利地恢复和发展经济，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此期间内还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之卓越，使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书将各个时期根据地税收的重要贡献和历史意义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革命根据地的税收与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诸项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实现了同步发展，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进步的关系，是一种紧紧捆在一起的多边互动的关系。财税工作为解放区军事和政治提供后盾和保障，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和中共政治上的先进清明，也为财税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印证了毛泽东在革命活动的早期就深刻认识的一条真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财政经济问题更大、更紧要、更需先行。解决吃、穿、住问题，本就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注意从财政经济原因去分析中国革命成败的缘故，得到财政经济是革命发展和壮大的物质基础这个认识，以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财税工作的出发点和理财原

则。例如，解放战争时期，以1947年的华北财经会议为标志，解放区的财政工作迅速成熟起来，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革命历史上，由于重视财税的作用、改善赋税征收和使用的质量而使革命事业迅猛发展的事例屡见不鲜；由于违背财税工作规律，加重人民负担而引发地区性乃至全局性的波动、失败的情况亦时有发生。这充分说明，财税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主导军事政治的基础性条件，甚至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结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在革命根据地由分散到统一的历程中，财税建设在政权建设中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革命根据地财税工作的另一条基本经验。中国的革命根据地是从“星星之火”即分散的革命根据地“燎原”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根据地的历史、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若想统一各自为政的状态是相当困难的。历史已经清晰地显示，每一次革命根据地的连片统一，都无一例外地从军事上的胜利，到革命政权的建立、统一和扩大，再到财税工作的统一，这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的工作步骤，也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全国解放前夕各解放区的统一，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三、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对于新中国税制的形成和税收工作具有超前的示范效应。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是新中国税收的实验阶段和经验积累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收的雏形。在此期间，革命根据地的税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管理经验，培养了大量的税务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项税收工作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有序、高效运转起来，财政状况能够迅速地实现根本好转，这些经验和干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才有力量克服困难和展开各项税收工作，这是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

走向成功的法宝。坚信民众的力量，秉持民众才是一切的精神，这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形成的正确的民众观密不可分，并在日后的税收工作实践中不断得到提高和升华。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主体，革命根据地的所有税收问题都需要与人民一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丧失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革命根据地的税收事业必将一事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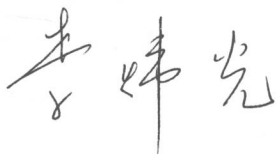
五、革命根据地的财税工作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且积蓄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坚持为人民谋福利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开源节流、勤俭节约、精兵简政的信条和思想，都是在财政经济政策和制度中逐步形成和坚持不懈的原则。具体到税收方面，确保革命战争之需要的原则，剥夺剥削者以贯彻阶级和革命的原则，区别对待、量力而行、合理负担、适当保护私人经济的原则，将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原则，废除以苛捐杂税为特征的旧税收制度、克服片面的“仁政”观点等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在当时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增强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实力中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它们中的很多内容，除了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部分以外，至今也没有过时。

本书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革命根据地财税史教学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力求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中考察赋税的性质和作用；同时，作者们没有回避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中难以避免的失误和争议，直面问题，实事求是地探寻其原因和规律，并且指出：其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而存在，为探索新的道路确立了历史指向，它要求从错误的道路上返回，重新思考、重新选择。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史，如果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算起，已经过去80余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成立60余年。历史和现实一脉相承，经验和教训相伴始终。革命运动中的迂回挫折和人为失误、某些举措后果不尽人意和点缀在历史间的尴尬也

回避不了，而且不应该回避。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①

今日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尽可能完整、准确的史料，客观地审视历史事实，忠诚地还原历史的真实，细细探究其中的原委，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审视的目的，既不是庸俗的歌颂，也不是苛刻的批判，而是深刻理解历史发展的社会条件和逻辑性，以为后世发展之思虑、之借鉴。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所做的努力算是一次近年来不多见的尝试，期待着各界的批评指正，也期待着后来者把根据地税收研究这个大课题做得更好。



2011年7月1日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目 录

第一章 初创：革命根据地税收的早期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税收思想	2
民国初年的财税状况	2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税收主张	6
二、土地革命的兴起和革命根据地初期的财政供给	12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2
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17
根据地形成初期的财政供给	24
三、日渐成形的财政政策和土地税收	29
废除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	29
财政负担主要放在剥削阶级身上	31
排除左倾思想干扰，注意筹款政策	32
全力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	33
发展公营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34
加强财经纪律，注意节约支出	35
建立税收制度，力争收入稳定	36

四、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经验总结	40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40
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客观条件	41
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观条件	42
五、井冈山的税收尝试	44
农村经济处于破产状态	44
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税收的指示	45
井冈山根据地的税收	46

第二章 蹉跎：中央革命根据地 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税收

一、“一苏大”方针和财政收入体系的建立	4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49
“一苏大”财税方针的提出	50
中央苏区财政收入体系的建立	52
二、反“围剿”中的财粮动员和农业税（土地税）	72
财粮动员面临的困难	72
财粮动员的措施	75
两次调整农业税政策	79
三次征集粮食运动	85
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与工商税收	87
苏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87
促进苏区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90
开展对敌斗争的税收政策	92
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税收管理	93
税收法制建设	94

税务机构与干部队伍建设	95
税收征收管理	100
五、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实践	105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05
川陕革命根据地	109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11

第三章 运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

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原则	113
先予后取	114
取己与取民相结合	116
增收不增税	119
普遍纳税	121
二、农业税制的改进与完善	122
田赋制度的恢复	123
救国公粮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124
“合理负担”制度的提出与推行	125
统一累进税制度的实施	128
三、工商税制的建立与完善	135
货物税	135
营业税	138
进出口税	141
临时贸易税	143
盐税	143
田房契约税	144
烟酒税	144

牲畜交易税	144
屠宰税	145
矿税	145
特别税	145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管理	146
抗日民主根据地税制建设	146
税收管理机构的建立	149
税收征管	153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务缉私	156
五、抗日民主根据地税收收入及结构	161
农业税收入	162
工商税收入	166
税收结构分析	179
六、抗日民主根据地税收的作用与意义	179
抗日民主根据地税收的作用	180
开启税收民主的先河	187

第四章 转折：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税收

一、土地改革运动与财政动员	193
从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	193
土地改革期间的税收政策	198
土地改革对解放战争的财政支持	201
二、新老解放区的财税政策	203
老解放区的财税政策	204
新解放区的财税政策	205
统一执行公平负担的财税政策	205

三、华北财经会议与财税政策的统一	206
华北财经会议的召开	207
华北财经政策的统一	210
四、解放区税收政策与制度演变	212
解放区的农业税收政策	213
解放区的工商税收政策	214
解放区税收的特点和意义	217
五、乡村财政整顿与农民负担	219
乡村财政整顿	219
农民的财粮负担和战勤负担	223
六、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解放区的税收实践	226
西北解放区	226
华北解放区	233
东北解放区	237
华东解放区	244
中原解放区	248

第五章 升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税收

一、城市税收制度和政策	256
中共七大以后的财税政策	256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城市接管指明方向	267
大城市的税收接管政策日趋完善	268
二、大中城市的接管和税收	271
北平市	272
天津市	275
江南城市	278

三、三大城市税收制度	281
北平市	281
天津市	284
上海市	289
四、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前后的税收	297
各解放区税制初步统一	297
中财委稳定经济的税收措施	302
五、解放区税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308
为革命战争胜利提供物质保障	308
为新中国税收工作开展创造条件	315
为全国统一税制奠定了基础	321
中国革命根据地税收大事记	323
参考文献	349
后记	353

第一章

初创：革命根据地税收的早期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通过斗争实践，在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并总结出来的。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工作，为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群众生活，摧毁封建土地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革命根据地税收的早期实践，指的是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的革命反击武装的反革命，举行了一系列武装暴动并建立了井冈山、闽西、赣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左右江、东江、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开始，至1931年1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时间的根据地税收工作。这段时间，是根据地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税收制度的阶段，也是从根据地成立初期，以打土豪筹款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向建立健全的税收制度过渡的阶段。当然，要深入了解革命根据地的税收理论和实践，就应该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税收主张和开展税收工作的历史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税收思想

民国初年的财税状况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不断加强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①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维持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将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它们利用战争和政治讹诈，取得种种特权，包括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协定关税、免缴中国国内商品流通税等税收方面的不平等权利。列强争相向中国输出商品，从中国掠夺廉价原料，勒索战争赔款。当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它们更利用资本输出的手段（包括在中国投资开办工矿企业和向军阀政府提供附有苛刻条件的贷款），盘剥中国人民，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掠夺中国财富。

商品和资本的输入，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破产，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借机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进入民国以后，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了，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却没有改变。

1913年4月，袁世凯^②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秘密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史称善后大借款）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五厘，以盐税关税等为抵押，分47年清偿，本息共计6789.36万英镑。中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②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就任正式大总统。1915年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因遭人民反对，于1916年3月撤销帝制，6月抱病而死。

国盐税的征收管理权从此被外国控制。1913~1914年两年间，袁世凯政府先后向外国借款20次，总额达3.7亿银元。通过这些借款，帝国主义攫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等许多特权。

1917年8月，北洋军阀段祺瑞^①政府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借口，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两年间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这些借款史称“西原借款”。日本利用收取贷款担保的方式，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特权，攫取了中国东北的铁路、金矿、森林的修筑和经营权，并控制了中国的电讯事业。

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军阀们纷纷扩充军队。根据相关统计，全国陆军从1914年的45万人激增为1919年的138万人。1918年军费支出占预算支出的70%。因为军阀割据，军阀之间混战连绵不断，有的地方的军费竟高达预算支出的90%。应当注意，这些还是经过粉饰的数字，实际数字比这还要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后，声明承认晚清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外债，保证清偿，并且无可避免地走上了靠外债度日的老路。国民党政府虽然冠冕堂皇地宣传与帝国主义各国改订新约、关税自主，但不过是在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把帝国主义在华享有的特权变相继承下来。如果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战连绵，那国民党统治的前十年就可以说是无一日无内战。其中有新军阀之间的混战，更有“剿共”战争。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②在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说：年需军费3万万余元，按全国每年收入，仅4万万余元，除外债1万万元外，全数移交军费尚觉不敷。新旧军阀要维持反动统治，偿付外债本息，进行内战，聚敛财富，只有将一切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更兼晚清直至国民党统治前期，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各自为政，军阀割据，税收制度破坏，杂税丛生，预征强索，人民陷于

^①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的首领。1916年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后下野，1924年又被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被赶下台。

^②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1929年任国民党军海陆空司令部参谋长，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历任军政部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职。